

英国早期小说的哲学考察

厉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Novel)及麦基恩的《英国小说的多重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Novel)在讨论英国启蒙哲学与文学的“对应关系”时,主要从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意义上予以描述,行文中“启蒙哲学”、“经验主义”、“认识论”等词虽间或可见,却较少从其时哲学家思想节点的推演及思想脉络的铺展上看小说的生成。出于此,有必要从英国启蒙哲学家在主客体关系、时间、空间三个方面的研究出发讨论其对英国近代小说所产生的广义上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小说;启蒙哲学;认识论;主客体;时空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24(2015)03-0061-08

收稿日期:2015-01-01

作者简介:厉伟(1986—),男,福建永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与思想研究。

柏拉图的“诗哲之争”发端以来,哲学和艺术“优劣、先后”之辩曾聚讼纷纷,好不热闹;但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二者关联似乎已然不成问题——文艺内部审美规律的自我繁衍及其对世界本质的非理性阐释竟指明了海德格尔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努力流向。哲学作为世界本质塑型者和阐释者的至高权威业已消解;而文学在逆转了哲学优势地位后,更提出了“内在地具有对哲学的预见”此一能力^{[1]135}。于此背景下,讨论英国小说的哲学环境似乎不合时宜。但亦正是在深入英国近代小说塑型的历史背景缝隙之后,我们会发现小说这一新的文学体式,之所以发生于 17、18 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因素对其无疑有“难以割舍”的影响力。

17、18 世纪之交的英国,工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积极躁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宗教思想世俗化,政治革命风起云涌,社会阶层变动凝合加剧;此种氛围在对英国启蒙哲学产生激烈影响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要求。以赛亚·柏林对这种要求的历史必然性做出了精辟的概括:

然而,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以及所有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古代学科却仍然停留在一片混乱之中,臣服于以往冥顽不化的时代的思想和语言的混乱。那些被新科学解放出来的人们理应寻求将他们的方法和原理用于那些显然比外在世界更加急需秩序的课题上去,这是自然的,也确实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的确,这一任务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一幅关于人类心灵的基本“能力”及其运用的可靠、清晰的图画,我们就不能确定知识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将关于物质世界的新图画与对人类甚为重要的其他问题——道德行为、美学准则、历史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律、情感和想像的“内在”活动方式,以及其他一切对人类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充分地联系起来。^{[2]5 ①}

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作为反映这幅新图画的“道德行为、美学准则、历史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律、情感和想像的”最主要的“内在活动方式”之一,与英国哲学的独特表现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 17、18 世纪英国文学,特别是英国小说这一新型文学形式时,都注意到了其产生与发展与该时期英国哲学发展、转换的一种“对应关系”^{[3]4-5}。麦基恩(Michael McKeon)在《英

①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国小说的多重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Novel)一书中提出,相对于哲学认识论上的从浪漫的理想主义到朴素的经验论再到彻底的怀疑论这样一条线索,英国叙事文学也走了一条从罗曼司传奇(Romance)转移至历史故事(History)再到小说(Novel)的发展路径^{[4]3-4}。伊恩·P·瓦特更为英国早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形式上找到了哲学起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几乎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得不接受某些类似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结论,文学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着同一种认识论上的天真的影响。”^{[5]9}显而易见,柏林所谓“至关重要的任务”这一先决条件,自然落到了其时的启蒙哲学家身上。

一、主客体的统一与书写自觉

作为一种叙事文类,小说必然涉及“谁在说什么”的问题,即叙事主体和叙事客体的问题。而这一时期的英国哲学则在认识论这个层面上为小说家开辟了道路。

自然之事物,或者说日常事物脱离神恩王国作为文学表现对象,展现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形态,是小说不同于既往“史诗—悲剧文学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既往的文学形式,其艺术内核有一种卢卡奇所谓的“对世界总体性的追求”的先验气质,其主客体区分并不明显,描摹对象总是处于主体意志追求的陪衬地位,而“只有在行为领域使自己与人们区分开来”,进而与物理世界对立即物理世界从被彼岸世界荒谬的固定中挣脱出来,显示自身的无意义后,小说才能完成“历史哲学上纯粹的从史诗向小说的过渡”^{[6]61}。而在哲学层面上把自然科学解放出来的客体/自然和主体/人联系起来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可以从培根那里找到一个系统的发端。而这种联系的关键结点在于人对知识的掌握,所谓启蒙的世纪,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培根一直深信,人类统治宇宙万物的权利深藏在知识之中。因为在培根看来,真正的知识是根据原因得到的知识,知识是以对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构成的。”^{[7]57}在扫清了认识论道路上经院哲学遍布的荆棘之后,培根提出了科学的方法,即坚持一条从物到感觉的路线:“全部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由感官的知觉沿着一条径直的、有规律的、谨慎的道路,达到理智的知觉,即达到真正的概念和公理。”^{[8]236}

这种认识论上的唯物倾向在霍布斯那里走向了较为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人类认知的对象被抽象成仅具有力学和数学意义的被动的物(Object),等待的只是主体的感觉:“每一种思想都是我们身外物体的某一种性质或另一种偶然性质的表象或者现象。这种身外物体通称为对象,它对人类身体的眼、耳和其他部分发生作用;由于作用的各有不同,所以产生的现象也各自相异,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都是我们所谓的感觉。”^{[9]156}尽管提出了感觉运动时“努力(endebour)”这一概念,承认感觉是客观对象的一种印象/幻象,具有主观性,但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把主体思维这种精神活动看成一种孤立的机械计算过程,割裂了人类认知的主客体统一。

这个问题在洛克那里,通过“观念”概念的引入,得到了部分解决。“观念是洛克认识论中最基本因而也是使用最多的概念。”^{[10]301}但洛克的“观念”不仅不同于笛卡尔主义的“天赋观念”,反而是对后者的批判:“因此,让我们设想人心就像我们说的白纸一样,没有一切文字,没有任何观念。”^{[11]68}“我们的知识是多么依赖正确运用自然赋予我们的能力,而极少依赖那些徒劳地设想在一切人类中的天赋原则的指导。”^{[11]64}观念在洛克认识论中并不等于心灵或者思维,也不是一种物质性实体,而是心灵和自然界物理对象之间具有的“一种朦胧的存在”(“a twilight existence”)^{[12]115},观念成为认知过程中人类心灵和终极客体之间加入的一个中介。霍布斯那里一切知识的来源——经验,在洛克那里被区分为外部经验和关于经验的内部观念,这样,主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通过“观念”这个概念实现。

至此,一种虽然在局部陷于二元论,却在整体上解决了刚从宗教思维捆绑下解放出来的主体如何认知世界的问题的认识论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这里系统化起来,成为丈量世界万物的“新工具”。而作为“上帝的自然之书”的万物亦成为了亟待经验和书写的对象。这种面对巨大未知经验的兴奋成为其时英国小说的一个隐题,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理查森的心理经验小说中都有丰富的表现。因而,评论者不难从早期英国小说中提取出一种迥异与先前文学样式的对异域经验执迷的航海叙事,对自然资源攫取的垦殖叙事,对心理经验发掘的早期心理小说叙事模式,等等。而这

种对自然汲汲于经验/探索的时代特性,在其时小说中最典型的表现无疑是叙事中的一种对物的命名、占有、使用的“恋物癖”倾向:

首先我在木匠的房间找到了三袋钉子和螺丝钉,一把大钳子,一两打小斧,尤其有用的是一个磨刀刃。^{[13]47}

在一个抽屉里,我找到了两三把剃刀、一把大剪子,十几把刀子和叉子;在另一个抽屉里,我找到了许多钱币,有欧洲钱,有巴西钱,有西班牙钱,有金币,有银币,一共差不多值三十六英镑。^{[13]49}

我拿了一些面包,一罐清水,一个驾驶用的罗盘,一瓶甘蔗酒,一满篓葡萄干。……我第二次拿的是一袋大口袋米,还有那把挡太阳的伞,又拿了一大罐子清水,两打面包或大麦饼,一瓶羊奶,一块酪干。^{[13]167}

这种各类名词对叙事文本的疯狂占领是之前各类文学体式所不曾遭遇的。^①这种名词攻势在斯威夫特那里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一种极具感官冲击的“名词的排泄”:大人国国王在反讽格列佛“政治妈妈”英国在过去100年的历史时,“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出现一连17个名词的并置;而格列佛在攻讦拉格多科学院之政治学院时,也是罗列一系列“清泻剂”:议会议员们需要“缓和剂、轻泻剂、去垢剂、腐蚀剂、健脑剂、治标剂、通便剂、头痛剂、黄疸剂、去痰剂、清耳剂”^{[14]161}一连11味药的并置。及至“慧骃国游记”时,这种单词并列构成的排泄式段落,满布在文本叙述之中,俯拾皆是,例如历数英格兰罪名时所用的“凶杀、偷窃、放毒、抢劫、假证、伪造、私铸假币、强奸、鸡奸、变节、投敌”^{[14]215},又在对马主人夸耀人类战争武器和战术时如数家珍地列出“加农炮、重炮、滑膛枪、卡宾枪、手枪、子弹、火药、剑、刺刀、战役、围攻、撤退、进攻、挖地道、反地道、轰炸、海战”^{[14]219},那种福柯指出的17世纪前“词与物”的神秘离散、错乱纠缠的状态,在斯威夫特的小说中被整合,这似可看作恢复了词语及其背面潜藏的个体经验/个体知识之间的“巨大的统一平面”,而这统一了的平面,又明白地指向一种人类可通感的日常经验^{[15]55}。即便是被誉为“心理小说之父”的理查森的笔下,在文本细密缝缀的心理活动间隙,一种对日常生活经验细致的模仿也表现在对细节物件的自觉关注上:

第七封信:亲爱的父亲,自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后,主人又给了我好多美好的东西。他把我召唤到老妇人那间小内室,拉开她的衣橱,给了我两条滚有佛兰德花边的头巾,三双缎面鞋子(其中一双里面有银质的带扣,另两双也不差,因为老夫人的脚很小,正适合我穿),几条花色纸带和几个蝴蝶结,四双精致的白纱长袜,三双丝质长袜,还有两幅华美的紧身裙。“帕梅拉,”他说,“你那不幸的夫人虽然年老了,但身材优美,显得很苗条。”我十分惊讶,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我收下长袜时内心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杰维斯太太不在那里,如果她也有长袜,那就算不得什么了。我相信,我收下那些东西时十分局促不安;他看到这一点,就微笑着说:“别不好意思,帕梅拉;漂亮的姑娘都是要穿鞋子和袜子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16]10-11}

理查森笔下这种伊恩·瓦特指称为“形式现实主义”(Formal Realism)的小说之区别于既往文学体式的特征,确如其指出,有一种哲学现实主义转向刻画的痕迹,这种印刻在此时小说家的笔触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对特殊个体的日常经验和对物的特殊癖好的细节化书写。但亦如麦基恩深刻指出的,“‘真实故事’的经验主义倾向抗拒传奇故事那种不可靠的理想主义诉求……这种倾向亦制造了带某种自我抵消性质的极端怀疑论……反过来又消除了真实故事作为一种简单经验主义文类的可靠性。”^{[4]88}诚然,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在休谟怀疑论的攻击下,确实出现了对经验的质疑之声,有论者拾以为柄进而对小说作为新型文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类质疑或便是卢卡奇“小说的形式难题”的表现一端。而这一形式难题无疑只能通过对小说文类的另一个本体论特征——历史主义——的阐释予以解决。

① 值得指出的是,对斯威夫特“名词宣泄”首创的强调,自然无法否认拉伯雷《巨人传》的先驱作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与《巨人传》有很强的互文关系。

二、时间之轮的拆解与线性发展

小说和历史的天然关联,如理查蒂指出的,在其命名上就可见一斑:“‘小说’事实上仅是那段时间里读者和作家讨论的各类散文体叙事作品众多指称中的一个,‘小说’亦常常被称为‘传奇’、‘历史’或更令人迷惑的‘真实历史’和‘秘史’。”^[17]叙事文类和历史的纠缠无疑可以上溯到荷马史诗,而18世纪的作者和读者如此高频地提及的“历史”,却令人侧目,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确证了梅尼克那令人振奋的推论:

历史主义的兴起……也许是西方所曾经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思想革命。因为迄今为止对于一种可理解的统一性和齐一性与对于理性的普遍有效性及其格言的支配性信仰受到了震动和瓦解,这是由于认识到理性无法为生命提供普遍信条,而只能提供一种具有显然个体化特征的无限多样的形式,而它们的最终统一性只能在一种不可见的形而上学的世界根基中才能找得到。如今,一切的历史事物呈现出了与从前别样的形态,它不再是平面化和简单的一览无余的东西,而是带有深不可测的背景要予以透视的东西。^{[18]30}

而这种“形而上学世界根基中”的寻找,又确定无疑地指向其时启蒙哲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历史主义所做的开拓。毫无疑问,17、18世纪英国启蒙哲学家,为人们确证新型时间观/历史观提供了可能。

时间概念在人类文明早期是模糊不辩的,时间与自然事物处于一种纠合状态,时间在行为主体处无法获得意识。及至古希腊时期,时间有了大致的分割和计算,时间观念主要以象征主义的神话模式表现:人们区分了时序女神和十二时节女神,但时间观念仍旧与其对世界整体性认识保持一致——采取了一种物我同一的混沌态度,故而时间在古希腊时期具有超越生理(生与死)的恒定性。这种恒定性在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史诗中的时间之于英雄和神祇都不具备生理意义,他们有面容上老幼之分,亦有生死之别,但这种区分和史诗对情节起讫的忽略一样,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时间”设定,具有卢卡奇所说的一种无异于神祇的无时间特性^{[19]112};这种无时间特性亦体现于情节,无论《伊利昂纪》还是《奥德修纪》,时间仅是一种表面流淌,并非情节发展的必要因素,缺少现实性的同时还在某种意义上混同于空间——时间能够多维度扩展,构成广延,但却没有方向。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时间观念的觉醒亦发生于这一时期,一种超越恒定性的循环观念萌发于人们的脑际,这在太阳神赫利俄斯和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座驾循环交替于天际上被予以了一种直观的表达,至此,“时间之轮”此一横亘至今的意象频频出现于各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

古希腊之后至中世纪,尽管其物理划分手段不断进步,人们的时间观念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古希腊的“循环”模式;无论在戏剧还是传奇文学中,其都无法实现与主体意识的现实生活经验的同一。戏剧创作自从亚里士多德起基本上囿于“三一律”这一被奉为古典艺术形式圭臬的“金科玉律”之内,戏剧主人公必须“一个太阳活动周期内”完成大于实际物理时间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行动。时空被严苛地压缩了。而在以《圣经》为模板的传奇故事中,表面上似乎频频出现时间状语,但诸如“突然间”、“巧合的是”、“出于偶然”等时间短语,对情节的规约和发展只是技术上的作用(这种时间节点往往决定了主人公命运的转换)而无法与日常生活经验接轨,故而巴赫金称其为“非理性力量干预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的时间”^{[19]284},这种时空观实际上如诺斯洛普·弗莱指出来的,“同希腊神话的差别在于权威性和社会功能,而不在于结构。”^{[20]9}

到了小说勃兴的18世纪,“乃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这首先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时间感觉的觉醒。”^{[19]236}日常生活经验的转型要求人们对时间的观念/感觉的形式问题进行即刻突破,这一要求在洛克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我们所以发生了联贯底观念,就是因为我们反想人心中这些前灭后生的观念底现象。所谓绵延就是那个连续中任何两个部分间的距离,或人心中任何两个观念出现时的距离。因为在我们思想时,在我们心中连续地接受各种观念时,我们知道我们是存在的。”^{[11]150}而洛克的时空观在巴克莱与休谟那里大致上得到延续并确证:“时间观念是由我们各种知觉的接续得来的,这些知觉可以是观念,也可以是印象,可以是反省印象,也可以是感觉印象。”^{[21]239}这样,时间解除了中世纪

以来的神秘性和恒定性,它与上帝的存在分裂开来,而与个人的存在及个人的经验/观念连结在了一起,历史观中的时间维度就这样脱离了神学封闭历史观的包裹,抛散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生活行动中,教堂钟声不再具有观念上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而这种对特定时空对特定个体思维/记忆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强调,在休谟那里更发展为人格同一性问题:“我们如果没有记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因果关系概念,因而也不会有构成自我或人格的那一系列原因和结果的概念。”^{[22]292}而自我和人格个性在特定时空中的体现又正是“小说的特征”^{[5]18-19},因为“它(小说)打破了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的较早的文学传统。……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对小说坚持在时间进程中塑造人物的影响。……小说本身对一段时间之内人物发展的关心远胜于其他任何文学形式”^{[5]19-20}。

这种对时间的主体意识自觉特性在笛福笔下的小说中可谓一览无余。《鲁滨孙漂流记》的第一句就包含一个较为确切的时间:“我于一六三二年出生于约克城的一个体面人家。”^{[13]1}其后行文中,时间的划分和使用更达到了巨细不糜的程度,既有长的模糊的时段如“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五年了……在我十二年前”^{[13]142}、“不到五六年的功夫”^{[13]143}、“这是二十五年以来我第一次听到……”^{[13]180},亦有精确至分秒的时间如“就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那个不详的时辰”^{[13]5}、“每隔三四分钟”^{[13]8}、“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钟”^{[13]83}、“一会到那里,我就……”^{[13]184}、“终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离开本国已经三十五年了”^{[13]252}。至于“当……时”、“突然”、“不一会儿”等无法计量的瞬即时间状语更是细细密密地缝缀在本文行文过程中。这种对时间的自觉把握和使用,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续记》和《海盗船长》中也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延续。如第7页“现在是一六九三年”、第25页“在一六九五年四月十日”及第212页“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八个月”^{[23]212}、“那大约是一六九五年的事”^{[24]4}、“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六日”^{[24]276}。可以这样说,笛福的小说是人类小说历史上第一次对时间有意识地系统地铺展,第一次倚靠时间作为结构文本的关键要素,文本的时间之犁第一次耕开了世界永恒时空封闭的土地,时间之轮被拆解,走向一种可度量,亦亟需度量的数量化和标准化(鲁滨孙立在海岸边的柱子上的每一个“精确”划痕^①^{[13]55}都可以作为这种时间资本概念的完美象征)。如果说作为一种“航海叙事”类型,《鲁滨孙漂流记》对时间的自觉有一种航海日记(Log)对时间准确性的技术要求的话,笛福的时间自觉在另外两个以固定的商业都市生活为时空背景的小说文本《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中,同样丰盛的时间展示则明白无误地宣告了时间意识的觉醒。这种以时间的迅速及其与事件的遇合产生了因果,从而构成了故事情节的自传性叙事模式——卢卡奇认为“最清晰地表明了小说素材离散无限性和史诗素材连续无限性之间的重大区别”^{[6]72}的模式,确立了小说文类论宣告了中世纪重复的时间循环观念的解体,洛克和休谟的时间“绵延”观念,在小说结构的时空中已然被践行。

三、空间感受的解缚与多维扩展

时间和空间在现实经验中必然是纠合的,不存在无时间的空间性,反之亦然。但在哲学领域辨析时(如同文学领域书写时),二者却可以被区分讨论。

当韦斯利·考特(Wesley Kort)指出“时间和现存性(Temporalit)出于其抽象本质及掌握的脆弱性之缘由,较空间显然更受哲学家的青睐”^{[25]1}时,他是站在康德以后的哲学谱系之立场上看待时空问题的,因为空间问题无论在古典主义哲学时期还是现代哲学时期都被给予了同时间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关注。

即便包含着众多问题,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570年—前526年)还是朴素地指出了宇宙观念中位置/空间的意义:“大地被认为是一个平坦的事物……天体并不在它四周旋转,而是在它上面的一个圈环中转动。”^{[26]53}这种朴素的空间观念在巴门尼德对“实在”观念的时空本性与现实经验关联的分析中及恩培多勒克对“虚空”(Void)的拒斥论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26]163},逐步萌发起来的空间观念在古希腊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种以

① 在《鲁滨孙漂流记》第83页里,鲁滨孙对自己因昏厥而少算了一天亦有清醒的认知,更可视为主体对时间的深刻把握/攫取的旁注。

古希腊早期几何学为代表的空间观念,在古希腊辉煌的城邦建筑史中以撼人视觉之完美方式展现出来。到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时期,关于“位置”(Place)和“空间”概念的差异则已然清晰了:“‘位置’是一个表面——一个容器的内部表面,它是与内容的外部表面相接触的。”^{[27]13}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中世纪哲学作为“神学的奴婢”,其对物理时空观念的探讨,一般而言总是纠缠于经院哲学繁琐而无意义的概念消耗战中,对彼岸世界和属灵生活的无限推崇,将指向现实经验的时空概念压缩为上帝性质的一个向度——大能的神乃是时间无限与空间的结合,间或有,亦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空间“容器”理论的重复。这种局面在牛顿那里得到了突破。牛顿澄清了日常经验中对时空及运动感觉的误用:“普通人正是从他们对可感觉到的物体的关系来领悟这些(指时间、空间、地方和运动)量。且因此产生了一定的偏见。”^{[28]7} 牛顿进而阐释了一种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绝对时空观,这种绝对时空观虽然被洛克质疑,但洛克亦吸取了牛顿时空观经验主义的部分,即“我们的空间观念是由视觉和触觉两者得来的”^{[11]134}。休谟更进一步把空间的无限可分性和时间的无限可分性用运动统摄起来^{[22]44}。这样历史的两个维度——时间与空间——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统一起来了,同时间观由“循环往复”到须被精密计量地线性发展一样,一种新型的空间感觉出现了。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哲学层面上,时间和空间感觉的辨析已然得到长足进展。在小说以前的文学书写领域,空间(Space)的概念却几乎等同于位置/处所/地点(Place)的概念,处于一种情节“容器”的陪衬位置:正如日常生活中的人必然出于某一位置做出某种行动一般,作者在结构文本时无意中对这一共识予以模仿。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在荷马史诗中一目了然。荷马史诗世界中的四界,奥林波斯山、冥界、波塞冬的宫殿及人间的差别似乎仅体现在前缀定语——“巍峨光明的奥林波斯山”,“深邃的海底”,“阴森可怖的冥国”——的区别上,其与人类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物理空间形态上的差别,仅不过是人物活动的背景(Settings)。而在最具转折意义的空间描写上,空间仍旧等同于地点:“求尸者”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紧张接洽的帐篷仅是“帐篷”;改变俄狄浦斯一生命运的“三岔口”仅是动作过程的必须载体——主人公“来到三条道路会合处的狭窄的山谷里”^{[29]360};一如战场是“战场”,军营是“军营”,旷野之为“旷野”,通观荷马史诗,此类地点几近没有任何性质修饰和景色描摹,其“容器”性质自不待言。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空间类型,仅加了定语“十桨的……华丽气派的”阿尔戈英雄船,如特洛伊木马一般,连基本的长宽高都没有,不过是装满了汲汲于杀戮的英雄的容器而已,并不具备任何比交通工具及攻城武器更多的文化意义。空间在荷马史诗以来的这种“容器”性质,在其后的早期传奇文学里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在整部《罗兰之歌》中,读者仅获得“龙塞沃”这一与“峡谷”、“西班牙峡谷”、“战场”等一系列同义替换的空洞名词,而罗兰的葬身之所更由第2357行的“一棵松树下”在第2874行被“偷换”成“两棵松树下”^{[30]137},地点的次要性和模糊性由此可见。另一方面,由于神秘主义因子的影响,中世纪文学中天堂、地狱等“异域空间”也被赋予较强的宗教文化色彩,如在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天堂三界被描摹成彼此各具特色、富于空间层次感的“异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史诗时期“场所”仅具有的简单的抽象性,具备了较为复杂的环境描写。但仍须指出的是,这种逶迤至《天路历程》、《失乐园》处的“场所”仍无法摆脱一种宗教神秘主义韵味,从“绝望潭”、“浮华镇”、“愉悦山”等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所内,读者根本无法获知任何与现实经验接轨的空间感,遑论《失乐园》中“用金链悬挂在空中的这个世界”^{[31]88}对世界如此缥缈的描摹了,即便在对伊甸园进行了一种以俯瞰视角的多层次观察后,伊甸园作为神学体系的模型,不过是一种宗教寓意暗示的集合^{[32]265}。而在《坎特伯雷故事》中,虽然从泰巴旅店至坎特伯雷的道路与20多个故事中的空间似乎构成了空间叙事理论指出的对时间截断的各横截面空间展示,也突破性地在一处情节中让人物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室内空间展开活动^{[33]498},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旅客们缰轡都没有扯一下就“我的故事讲完了,市镇也快到了”^{[33]508},继而又“这时我们正走近一个村子”^{[33]771},我们无法得知路途中的任何景致也不知队伍行进多久,其动作仿佛在抽象时空中演进,地点只是一个个无目的的抽象名词,这种含混不清或言陷落的时空体正是巴赫金指出的“超时间空白”^{[19]280}。

到了笛福笔下,一种带有明确理性思维的空间观念渗透于文本结构之中,空间/场所的使用和选择不再是散漫随意和无目的性的,对特殊时空环境尽量细致的描摹,使得小说人物在虚拟的时空结构中获得了和现实经验接轨的特殊性,故而瓦特称“笛福似乎是我们的作家中第一个使其全部事件的叙述具体

化到如同发生在一个实际存在的真实环境中的作家”^{[5]23}。这种迥异于传统文类那种要么流于抽象,要么随意混乱,要么仅作为人物活动“容器”的空间结构方式,甚至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这样一个压缩于极端封闭空间内的文本中亦能得到充足的反映:

我根据我的情况,决定我要选择的地点必须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像上面所说,要卫生,要有淡水;第二,要能遮住太阳的热度;第三,要能避凶猛的动物……第四,要能看得见海,为的是万一上帝让什么船只经过,我不至于失去脱险的机会……

……我在一个小山坡旁边,找到了一块平地。……在那块山岩前面,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仿佛一个山洞的进口,但实际上里面并没有山洞。

在这山坳前面有一块很平的草地……这块平地不过一百码,长不过二百码,在我门口像一块草坪一样。它的尽头崎岖崎岖地斜了下去,一直通到海边的低地上。这地方是在小山的西北偏北的地方,所以小山每天可以把太阳遮住,一直到太阳转到西南方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太阳也就快落了。^{[13]51}

这恐怕是人类叙事文类史上第一次对空间进行如此细致的描绘了。其突破性更在于一种理性思维对空间感的介入。空间不仅仅作为一种实在的物质广延容器被读者以无缝拼接的方式与实际经验接合,空间还被赋予了复杂的目的性——作为人类持存、资源攫取、生产生活的一种资源,同时间的被计量一样,第一次被有意识地精心选取。因而,可以说英国早期小说中的空间已经模糊地具备了列斐伏尔“文化地理学”的意义。这种不同于既往的时空观,在笛福的都市背景小说中得到了更鲜明的展现,除却与上述目的参与明显的空间选择外,还体现在特殊形式空间——马车上。马车(Hackney-coach)同咖啡馆一样作为18世纪新型的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经验,其不仅成为人物位移的物质载体,甚至是情节发展/转捩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摩尔·佛兰德斯》中,佛兰德斯在巴托罗缪市集上偶遇的那个绅士甚至想在马车上与其发生关系^{[34]174};公共马车候车站还成为了佛兰德斯一种新型诈骗发明的场所;即趁当时公共马车站管理不成体系,假装成马车车夫的妻子以施展骗术^{[34]185};马车更成了佛兰德斯藏匿赃物的地点^{[34]199};公共马车亦是其兰开夏丈夫作为盗匪抢劫的主要目标^{[34]143}。而在《罗克姗娜》中,作为改变罗克姗娜命运的关键事件,其珠宝商丈夫的遇袭,其女儿与丈夫的错身而过亦“恰好”发生在马车之上^{[35]346}。但须指出的是,笛福笔下这种自觉的空间观念,并无法完全置于列斐伏尔等人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下予以审视,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及叙事技巧层面。因此,笛福笔下人物对周遭环境的理解即便是自觉的,却仍旧是朴素的,因为“现代人具有的流动要求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扎根,因而其对某空间的经验和理解会是浮浅的”^{[36]183}。当然,笛福小说在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两个向度上的解缚,无疑为其后理查森“心理小说”开辟了道路,亦为菲尔丁那伦敦风俗镜子式的全景描摹打下了基础。

四、结论

小说的兴起固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对麦克里恩(K. Mclean)在《约翰·洛克与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一书中哲学家引领文学家此一观点颇有疑虑^{[37]67},哲学观念的解放与新的文学体式的兴起不会是亦步亦趋的,但无可否认的是,17、18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通过其世俗化进程,特别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对主客体的解放,对时空观的深入辨析,无疑为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英国早期小说中新的对象、新的语言、新的经验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充斥着理性目的论的现实时空经验书写,使既往文学形态中那渺远、抽象不可信的时空体被重构;英国早期小说那浓烈馥郁的日常生活气质,如巴赫金所言,让河床上的每一个石子都获得了意识,叙事由小说处鲜活了起来。

参考文献:

- [1] 刘阳.小说本体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2] 以赛亚·伯林.启蒙的时代[M].孙尚扬,杨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3] PAULA R., BACKSCHEIDER, CATHERINE INGRASSIA.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Novel and Culture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4] MICHAEL MCKEON. The origins of English Novel: 1600-1740 [M].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Ltd., 1987.

- [5]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M]. London: Random House (Pimlico), 2000.
- [6] 卢卡奇. 小说理论 [M]. 燕宏远, 李怀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7] 胡景钊, 余丽嫦.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8] 培根. 新工具 [M]. 许宝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9] 霍布斯. 利维坦 [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0] 胡景钊, 余丽嫦.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11] 洛克. 人类理解论 (上) [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2] R.I. 阿龙. 约翰·洛克 [M]. 陈恢钦,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13] 笛福. 鲁滨孙漂流记 [M]. 徐霞村,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14] 乔纳森·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 [M]. 杨昊成,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5.
- [15]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16] 理查逊. 帕梅拉 [M]. 吴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7] JOHN RICHETT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6.
- [18]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历史主义的兴起 [M]. 陆月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19] 巴赫金. 小说理论 [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20] 诺斯洛普·弗莱. 世俗的经典: 传奇故事结构研究 [M]. 孟祥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1] 傅有德. 巴克莱哲学研究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22] 休谟. 人性论 (上) [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23] 笛福. 鲁滨孙漂流记 [M]. 艾丽, 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 [24] 笛福. 海盗船长 [M]. 张培均, 陈明锦, 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 [25] WESLEY KORT.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 [26] 泰勒. 从开端到柏拉图 [M]. 韩东晖,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27] 大卫·福莱. 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 [M]. 冯俊,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28] 牛顿.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M]. 赵振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29] 库恩. 希腊神话 [M]. 朱志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30] 佚名. 罗兰之歌 [M]. 马振骋,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 [31] 弥尔顿. 失乐园 [M]. 朱维之,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32] 胡家峦.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33] 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 [M]. 黄杲炘,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34] 笛福. 摩尔·佛兰德 [M]. 梁遇春,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35] 笛福. 罗克珊娜 [M]. 天一,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36]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 [37] 卡洛·金兹伯格. 孤岛不孤: 世界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四论 [M]. 文涛,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陈静雄)

A Philosophic Research of Early English Novel

LI 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When analyz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and literature, Ian Watt's *The Rise of Novel* and Mckee's *The origins of English Novel* we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 Although words as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Empiricism" and "Epistemology" can be seen from time to time, scarcely did those writers study the rise of novel on a perspective, in which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ose English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idea unit are been attached. Based o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analysis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Time and Space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s influential, in a broad sense, on the early English novel.

Key words: English nove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Epistemology;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View of time and space